中国结婚对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

结，还是不结？这是个问题

王青青　王俊岭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中国传统理念正悄然发生变化。

民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301.7万对，同比下降5.7%，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如果与5年前同期结婚人数的高位428.2万对相比，2018年一季度已经下降了29.54%。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

结婚率逐年走低

结，还是不结？民政部的统计显示，这一数据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异。

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其中结婚率最低的5个省市分别是上海、浙江、天津、江西和山东，其结婚率分别为：0.45%、0.61%、0.61%、0.62%、0.63%。相比之下，结婚率最高的5个省份分别为贵州、安徽、西藏、青海、河南，结婚率均在0.91%以上，而这些地区人均GDP都相对较低。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相反的走向。

结婚率走低，年轻人怎么想？

在北京从事审计工作的于贤表示，大城市节奏快，竞争激烈，“审计行业加班出差是常态，没有时间约会，也没有时间相亲”，恋爱都顾不上谈，怎么可能结婚？这反映了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窘境。即使是有稳定恋情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也表示不敢轻易“谈婚论嫁”。上海白领徐珊直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结婚后又必然会考虑生子和育儿的支出”，从个人到家庭的转变并非易事。

经济发达地区房价相对高昂，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步伐。于贤直言：“没有房子，丈母娘肯定不愿意，住在合租房里也有诸多不便。但是像北京这样的高房价，35岁前难以买得起。”

此外，很多都市适婚青年表示“宁缺毋滥”，不着急结婚。在南京工作的陆子夫，有房有车有时间，但他仍表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要找到三观一致，能进行深层次沟通的人，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有分析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受适婚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结婚率仍可能持续走低。

城市化进程是推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表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看出生率——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翟振武进一步说明：“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是如今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这一变化既在意料之中，也与之前的预估相符。”

看结婚年龄——婚龄推迟成为当前结婚人数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江苏省发布的婚姻大数据显示，近5年来，江苏人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增长1岁。上海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26.51岁，到了2014年达到28.14岁。这一变化在王洁的意料之中，在北京读博的她说：“班里的同学都二十七八岁了，除了两个工作后重回学校读书的同学，毕业前大家都没有结婚的打算。”

翟振武分析，现在我国成年人口近一半会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上升，相应的年轻人独立、工作和成家的年龄也会推后。早些年，年轻人到了二十三四岁，很多就结婚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可能本科毕业就已经23岁了，结婚的年龄必然会不断推后。相当一部分适婚年龄的人并没有结婚，也使得结婚人数偏低。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

鼓励婚育应受重视

面对逐年下降的结婚人数，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应多尊重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予以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认为，地区经济条件越好，对单身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也越宽容，“发展水平越高，社会越多元化。不结婚、单身或者离婚，都是个人选择。”

陆杰华认为，“80后”“90后”跟“60后”“70后”明显不同。“经济的发展带来收入增长，互联网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社会的变化，了解到世界的发展。对他们而言，结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经历，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改变，人们应当转变思想，与时俱进，应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婚等给予更多宽容。

然而，相比5年前，结婚人数下降126.5万，这一变化仍值得政府层面关注。陆杰华说，在我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常见的未婚生育和事实婚姻等，在我国尚未得到承认。因此，结婚率降低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影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较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凸显我国老龄化加速的现状。结婚率和出生率的走低势必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社会的问题。

专家建议，针对二者的紧密联系，国家应当重视该问题，认真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比如，可以适当延长婚假、产假，倡导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促进结婚生育。此外，政府也应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财政政策，降低家庭的税务负担；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优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价让很多人难以在年轻时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因此稳定房价、为大家庭提供廉租房等措施将能缓解部分压力。

手语盲文国家标准将实施

自7月1日起，《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将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实施。这将是国家通用语言的丰富和补充，是对听力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使用手语和盲文的语言权利的保障。图为6月25日，山东临沂市沂南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学习手语。

杜昱葆摄（新华社发）

回乡大学生当选村支书

日前，陕西省延安市1784个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全部完成，共有152名回乡大学生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图为延安市安塞区真武洞街道办汤河村党支部书记白晋英（左）在本村集体西瓜大棚里指导村民进行西瓜均匀受光。白晋英2017年7月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回到家乡。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广东发放中小微企业“大礼包”

据新华社广州6月25日电（记者毛鑫）为期6天的2018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日”活动25日在广州启动，系列公共服务礼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2017年联合国第74次全体会议决定每年6月27日为“中小微企业日”。在本次广东省“中小微企业日”活动现场，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介绍了新出台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为中小微企业发放了一系列公共服务礼包，包括首发1000万元中小微企业服务券以及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的226场公益性培训计划，涉及创业创新、融资等专业服务。

据介绍，目前广东90%以上的市场主体、8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50%以上的生产总值和税收均由中小微企业贡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姚德洪表示，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保持广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大任务。

北美外教进乡村课堂

钟昊梅

乡村小学生如何获取优秀的外教资源、学到纯正的英语？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VIPKID开启了“北美外教进乡村课堂”的公益项目。

2017年项目启动之初，VIPKID选取贵州、云南、甘肃5所乡村学校的5个班级为试点班级，利用互联网技术，请北美具备专业教学资质的外教老师，为深山的孩子们授课。2017年9月，该项目顺利进入第二阶段，试点学校扩展到100所。“以前想找一名好的英语老师都太难了，现在孩子们却能跟北美外教学英语，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位小学的校长反映。

为给英语基础并不扎实的学生上好每一节课，外教们在教学上格外用心。课前准备丰富教具便于学生理解，课上转换多样讲课方式调动学生兴趣。学生们很快从第一节课胆小不敢发言变成了争先恐后地在镜头前跟外教打招呼。

长期的学习互动中，外教与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小学生贴心地为外教送上生日惊喜；有的给外教亲手制作圣诞节贺卡。今年4月16日，在“北美外教进乡村课堂”项目一周年之际，外教杰西卡漂洋过海来到云南鼠街小学，给孩子们送上真挚的祝福。“孩子们的纯真笑容，是我见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目前，VIPKID公司的“北美外教进乡村课堂”项目已拓展至近300所乡村学校，155名北美外教参与其中。未来，VIPKID将进一步优化项目运营，使得这一公益活动走进更多乡村小学，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图为云南曲靖市大坡乡法土小学的孩子们在外教课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吴家忠摄

特色菊花铺就脱贫路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东漳堡镇推进产业扶贫，引导农民发展药菊、茶菊等特色菊花种植，获得良好经济收益。目前，东漳堡镇菊花种植面积近3000亩。

图为6月25日，东漳堡镇南赵村农民在采摘菊花。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蒜价下跌，这里的蒜农为啥不慌张？

陈国峰

早早把大蒜收完，鲜蒜还没干透，山东金乡鸡黍镇西李村的王小存就把16000多斤大蒜以0.9元／斤的价格全部卖掉了。

收购价不到1元／斤，这是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金乡县当前的大蒜行情。记者采访多名蒜农得知，把人工、蒜种、化肥、地膜、浇灌等成本折算下来，一斤大蒜卖到2元左右才能保本。

明显是亏本的买卖，王小存为啥卖得这么干脆？记者从位于西李村西头的华光集团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进入收蒜季，华光集团的加工厂就开始热闹起来，周边不少农民聚拢到这里。王小存卖完大蒜后，和村里的其他男劳力来到大蒜收购点，干些装车卸车的活，一天下来能挣二三百元。王小存媳妇也找了个扒蒜皮、削蒜须的活，手快的时候一天能挣200元。

大蒜价格的低迷并没有让金乡蒜农心慌意乱。西李村300多户蒜农都可以到大蒜加工厂或交易中心打工。

在距西李村不远的张寨村，种植户袁可顺将10亩大蒜卖光后，选择到金乡周边的县里收蒜。像王小存、袁可顺一样，种植大蒜不再是金乡蒜农唯一的经济来源。当地政府部门引导农民融入种植、收储、加工、销售等大蒜产业各环节，亦农亦工亦商的“三栖”姿态是如今金乡农民的明显特征。

蒜价波动因受全国乃至全球大蒜供给影响，单靠一县之力实难解决，但地方政府可在保护种植户利益问题上有些作为。金乡通过下力气发展大蒜加工产业，为蒜农开辟了田间地头以外的增收渠道。在金乡蒜农眼里，不存在“农闲”时节，除了种蒜、收蒜，他们依托全县700多家储存加工企业，变身产业工人，一年四季围着大蒜转。

实际上，金乡从大蒜种植环节就通过发展套种、间作等种植方式，规避老百姓单靠种蒜带来的收入波动。金乡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子乾介绍，经过多年引导，当地蒜农已经习惯在种蒜的同时套种棉花、辣椒、西瓜等作物，即使种大蒜赔了也不会慌神，还有其他果蔬顶上来。

王小存家9亩蒜田各拿出一半套种棉花和青椒，一亩青椒可收入3500元，一亩棉花能卖约2000元。

比起王小存，袁可顺还多了道“护身符”。种了十几年大蒜的袁可顺已经连续三年投了大蒜价格保险。

金乡县物价部门介绍，今年的大蒜保险目标价格为1.7元／斤，保险公司将根据6—8月监测的平均收购价，对跌幅部分进行赔付。当地将保费定为140元／亩，蒜农和政府四六开，分别承担56元和84元。目前，金乡大蒜投保面积达30万亩，约为全部种植面积的一半。

“前两年大蒜行情好，保险没有发挥作用，今年这形势肯定能得到保险公司赔付。”袁可顺气定神闲地说，像是吃下了“定心丸”。眼瞅今年种蒜赔钱了，王小存开始意识到大蒜保险的作用，“今年政府再号召的时候肯定加入”。

（据新华社电）